

万卷方法

混合方法论： 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结合

MIXED METHODOLOG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阿巴斯·塔沙克里 (Abbas Tashakkori)

著

查尔斯·特德莱 (Charles Teddlie)

唐海华 译

张小劲 校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万卷方法

混合方法论： 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结合

MIXED METHODOLOG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阿巴斯·塔沙克里 (Abbas Tashakkori)

查尔斯·特德莱 (Charles Teddlie)

著

唐海华 译

张小劲 校

重庆大学出版社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Mixed Methodolog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by Abbas Tashakkori and Charles B. Teddlie,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Copyright © 1998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8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混合方法论: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结合。作者:阿巴斯·塔沙克里,查里斯·特德莱。原书英文版由 Sage 出版公司出版。原书版权属 Sage 出版公司。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 Sage 出版公司授予重庆大学出版社,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版贸核渝字(2006)第 16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混合方法论: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结合/(美)塔沙克里(Tashakkori, A.), (美)特德莱(Teddlie, C.)著;唐海华,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3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 Mixed Methodolog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ISBN 978-7-5624-5110-5

I. 混… II. ①塔…②特…③唐… III. ①定性决策—分析方法②定量决策—分析方法 IV. C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3052 号

混合方法论: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结合

阿巴斯·塔沙克里 查尔斯·特德莱 著
唐海华 译 张小劲 校
责任编辑:吴文静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任卓惠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5.75 字数:164千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24-5110-5 定价:23.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作译者简介

阿巴斯·塔沙克里 (Abbas Tashakkori)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从事研究方法论教学的教授。他于 1979 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 并曾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人口学中心从事博士后工作, 在德州 A&M 大学的教育管理学系做过访问学者。他先后任教于伊朗设拉子大学、美国史丹森大学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心理学系。

查尔斯·特德莱 (Charles Teddlie)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从事研究方法论教学的教授。他于 1979 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取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 此后在新奥尔良大学、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此外, 他先后在英国、伊朗、比利时、挪威、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国就学校效率研究、研究方法论教学等主题进行过学术访问和演讲。

唐海华 200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讲师, 对于政治学方法论的教学与科研有相当的知识积累和实践经验。

张小劲 1989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现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长期从事政治学方法论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前言

本书是对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和混合模型(mixed model)研究这一发展迅速且备受关注的方法论领域的补苴罅漏之作。尽管当下已有若干位作者正在多个领域内就混合方法问题有所撰述,但是他们的许多文章和章节仍缺乏明晰的概念,他们也往往没有对正在应用的方法举证出具体的案例。就此而论,本书的独特贡献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对混合模型和混合方法研究,我们构建了一个在逻辑上周全详尽的分类体系;第二,针对每一种主要的研究类型,我们提供了可用于实践的操作指南。

尽管作者开始在上述多个领域就这些新的方法发表了相关文字,但定量传统的主流学者(如实证主义者和后实证主义者)以及定性传统的主流学者(如建构主义者),都还没有接受混合模型的研究。譬如,著名的后实证主义的“圣经”式著作(Cook and Campbell, 1979)仅仅是在讨论单一方法的偏畸时才提及了混合方法。与此相似,《定性研究手册》(Denzin and Lincoln, 1994)直接论及混合方法问题的只有一章的篇幅(即关于临床诊断研究方法的一章)。

混合方法的主要研究文献目前在多个领域中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很少有作者尝试过对这些方法作出类型学分析(参见Creswell, 1995; Miller and Crabtree, 1994; Morse, 1991)。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一些主要领域和次领域已经要求采用混合方法。这些领域包括教育、评估、护理、公共健康、社会学、临床研究、管理科学、社区心理学、女性研究和学校效率研究等。

这些不同领域对混合方法和混合模型研究的应用存在着相似性。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对混合方法和混合模型研究进行了逻辑分

类,指出了我们在这些不同领域中所辨识出的混合方法之间的相似性。我们明确区分了混合方法与混合模型:混合方法是指在一项研究的方法论中(如在资料收集阶段)融合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路径,而混合模型研究则是指在研究过程的所有阶段(如概念化、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和推论)中都融合了定性和定量两种路径。在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精细的分析之后,我们认为,混合模型研究是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中日益强化的一种发展趋势。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列出了混合方法和混合模型研究的各种方法和策略(譬如抽样、测量、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其中,我们首先按照这些主题概括归纳了传统的研究路径,然后我们展示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如何将不同的研究技术融合在一起。在这一部分,我们列举了从多个领域中挑选出的混合方法论路径的特别案例。在挑选这些案例时,我们并未对研究的整体质量或水平作出判断,它们之所以被展列在这里只是为了说明多个领域正在应用着的这种方法。此外,我们可以从多个学科中找到成百上千的应归类为混合型的研究案例,但此处只能展列出一小部分。

在本书第三部分,我们进一步列举了关于混合模型设计的简单案例和扩展案例。为了提高本书对研究生或混合研究的首次使用者的参考价值,这些案例中收入了几篇我们自己的学生近期所撰写的论文。这些论文大多采用了顺序型混合方法(sequential mixed methods)或平行型混合方法(parallel mixed methods),即交替使用或同时使用定性和定量两种基本路径去分析同一个现象。这些案例进一步精确地说明了这些论文的研究及其他的研究是如何进行混合设计的。

我们认为,混合方法和混合模型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其发展受到了本书在第一部分所反思的范式之争后遗症的延阻。如今,这一争论已经离我们远去,研究者开始自由地使用最适合于他们所研究问题的各种方法。同时,我们还认为进行研究时应该确立明晰的目标,无论是回答一个疑问、解决一个问题或是评估一个项目;我们强调,相对于范式而言,研究的问题才更为重要,更具有优先性;我们主张,研究者为了回答其研究的问题,应当同时从定量和定性两种路径中选择其合适的方法。就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大多数课题而论,其研究的问题大都可以用混合方法或混合模型设计来求得最佳的解答,远胜于单一地依赖于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路径。

致谢

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同事以及学生抱有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在本书写作期间所赐予的支持和理解。我们还必须感谢 Marylyn Sines 为本书所提供的编辑协助,感谢 Spencer Maxcy 教授针对第一部分所提供的建议和评价,感谢 Mindy Crain-Dorough 所提供的图书查询。同时,我们还要感谢 Sharareh Nikbakht 所准备的图示和图形。

第一部分 研究中的范式与政治

1 导论:社会和行为科学中的混合方法与混合模型研究	2
范式之争与混合方法论	2
关于范式之争的更多详情	5
方法论路径在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内的演变	12
2 实用主义与研究策略的选择	19
研究问题主宰,而非范式或方法为王	19
范式之比较	21
与单一方法有关的设计问题	29
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中传统资料收集方法的类型学	35
3 混合方法和混合模型研究的研究设计问题	38
与混合方法研究相关的设计问题	39
与混合模型研究相关的设计问题	49

第二部分 研究的方法与策略

4 抽样、测量及推论质量	59
抽样及其与通则化/推论之质量的关系	62
测量的质量和推论的质量	75
信息/资料的质量:定量研究的视角	76

2 万卷方法 混合方法论: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结合

推论/结论的质量:定量研究的视角 83
资料的质量与推论:定性研究的视角 88

5 资料收集策略和研究程式 92

资料收集的传统路径和替代路径 92
资料收集策略 97

6 传统资料分析策略的替代性选择 109

传统的定量资料分析 109
传统的定性资料分析 114
混合方法研究的替代性分析策略 122

第三部分 混合模型研究的运用、案例和未来的方向

7 混合模型设计的案例 134

确证性研究 136
探索性研究 140

8 混合模型设计的扩展案例 144

一个平行型混合模型研究(类型Ⅶ)的案例 148
一个顺序型混合模型研究的案例 149
在单项研究中分步骤进行简单和复杂的混合模型设计的
案例 151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162

参考文献 165

译后记 171

研究中的范式与政治

第一部分

这一部分将讨论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中的范式与政治。第1章和第2章将回顾范式之争的主要问题。范式之争即围绕着相互对立的世界观和信仰体系就彼此的优缺点所展开的论争,而在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这种争辩主要发生在实证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之间。同时,在第1章和第2章,我们还将讨论另一种范式——实用主义。在第2章,我们将进一步区分四种主要的科学范式,即逻辑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与建构主义。

在本部分中,将对社会和行为科学的方法论路径进行分类:包括单一方法、传统意义上的混合方法,以及一种趋于将定性研究路径和定量研究路径结合起来的独特方法——我们称之为混合模型研究。混合方法是在研究的具体方法上将定性研究路径和定量研究路径结合在一起,而混合模型研究则是在研究过程的所有阶段中都将这两种路径结合起来。

立足于三个主要研究步骤(即确定研究问题/假设、资料收集和研究操作、分析和推论)的差异性,第3章对混合模型研究进行了新的分类,这又成为本书其余部分篇章安排的依据。

导论：社会和行为科学中的 混合方法与混合模型研究

范式之争与混合方法论

范式之争举隅

在过去 30 年里,就两种主要范式或模型的高下优劣问题,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中业已发生过多场辩论或“争战”(如 Datta, 1994; Gage, 1989; Guba and Lincoln, 1994; House, 1994; Rossi, 1994)。这两种模型,一个是众所周知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路径,另一个则是人们所熟知的建构主义/现象学路径(如 Cherryholmes, 1992; Guba and Lincoln, 1994)。

所谓“范式”,可以界定为引导研究者的世界观或信仰体系(Guba and Lincoln, 1994)。范式在今天的社会和行为科学中所被赋予的重要地位起源于库恩在 1970 年发表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他在这本书中说明,范式是在任一特定领域中都能得到重复使用的模型,相互竞争的不同范式可以同时存在,尤其是同时存在于并不成熟的科学学科之中(Kneller, 1984; Kuhn, 1970)。

实证主义范式强调所谓的定量研究方法,建构主义范式则主张定性研究方法(如 Guba and Lincoln, 1994; Howe, 1988; Guba and Lincoln, 1985)。因此,关于这两种范式的争论有时亦被称为定性一定量之争(如 Reichardt and Rallis, 1994)。缩写词 QUANs 与

QUALs 用来指代这些争辩或“论战”的参与者,QUANs(定量论者)是指那些倾向于定量观点的人,QUALs(定性论者)则指倾向于定性观点的人。

这种范式之争的战火波及多个重要的概念性问题的“战场”,譬如“现实的本质(nature of reality)”、“因果联系的可能性(possibility of casual linkages)”等。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中没有哪个学科可以在这场范式之争中袖手旁观而不必表明立场。Datta(1994)将这场战争中的参与者称为“摔跤手(wrestlers)”,而我们更愿使用另一个词——“斗士(warriors)”。

教育学中的“斗士”有 Guba 和 Lincoln(1985),他们认为实证主义的原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定量方法论已经不再可信。这两位作者声称,建构主义和定性方法正冉冉上升。Smith 和 Heshusius 也在教育学领域著书立说,他们在 1986 年主张对两大阵营的沟通“关上大门”,因为这两种范式的相容性使得继续对话毫无意义。因而他们的观点又被称为“不相容论”(incompatibility thesis)。

类似的,心理学在 1970—1980 年代也见证了学者 Cronbach(1982)、Cook 和 Campbell(1979)之间所发生的大规模方法论之争。这场争论主要集中于内部效度(强调实证主义者视之如神圣的受控环境(controlled settings))与外部效度(强调建构主义者趋之若鹜的自然环境(natural settings))之重要性的高下优劣问题。1973 年,Gergen 也质问道:“社会心理的科学性是可能的吗?”他对支撑着心理学各个分支领域的实证主义教义,特别是超越时间一场景之通则的可能性问题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而在人类学领域,Gardner 在 1993 年对 Margaret Mead 在萨摩亚群岛的人类学研究工作进行了指责,理由是 Mead 过度依赖于预设性的概念,而且还天真地接受所谓关键受访者的信息。这些反应典型地体现了实证主义阵营对建构主义或“自然主义者”阵营的批判。

关于这场争论的最后一个范例则发生在评估研究的应用领域。Datta 于 1994 年指出,美国评估研究协会连续三任主席(Fetterman,1992;Lincoln,1991;Sechrest,1991)的“对话”,在维护自己的方法论立场并攻击与其相对的“另一派”上,都显得非常强

硬。尽管这样的争辩在所难免,然而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却日益丧失其实际效果。

范式之争的结束与混合方法的出现

针对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的两大范式之争,许多人也曾尝试提出和解之道。“和平主义者”由此开始形成,他们认为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可以相容的。在教育学和评估研究领域,一些作者(如 Howe, 1988; Reichardt and Rallis, 1994)立基于一个不同的范式,提出了相容理论,也有人将这一独特的范式称之为“实用主义”。就此而论,对于范式之争中的和平主义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实用主义者”。

正是在这一时期,范式之争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变得相对中庸了,因为许多活跃的理论家和研究者都开始采取“范式相对主义”的立场,或对研究中的特定问题随意采用某一种哲学和方法论路径(如 Howe, 1988; Reichardt and Rallis, 1994),甚至连一些最著名的斗士(即 Guba 和 Lincoln)也发出了息事宁人、结束争战的信号。他们声明:

Gage 于 1989 年所形容的范式战争的隐喻,毫无疑问是过头了。将过去 10 年、20 年中的讨论和口角形容为战争,已经使事情被涂抹成远远超出必要程度的对抗。比现有任何一种范式更加圆通和精巧的新范式出现之际,便是范式间分歧的解决之时。而这种情形只有在这几种不同观点的持有者聚在一起讨论他们之间的分歧时才最有可能发生。(Guba and Lincoln, 1994:116)

如今,实用取向的理论家和研究者们提出了“混合方法”(亦可称“混合方法论”或“方法论混合”),力图同时包括定性路径和定量路径的因素(如 Brewer and Hunter, 1989; Patton, 1990)。例如, Greene, Caracelli 和 Graham 在 1989 年就展示了运用混合方法所完成的 57 项研究,并且描述了这些混合研究的设计特性。我们将在本章稍后进一步讨论混合方法的具体类型问题。

当前的状态

我们接受范式相对论中所暗含的假定,即范式之争已经结

束,并且被上面简要提到的实用主义取向所替代。正如 Brewer 和 Hunter(1989:22)所认识到的,大多数社会和行为科学的主要领域如今都将多元方法的使用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1950 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得到了极大发展。伴随着这些发展,如今实质上已经没有任何重大题域是死守在一种方法之内展开研究工作的。”

范式之争的缓解对许多领域的研究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大多数研究者如今都主张不论哪种方法,只要适合研究就行,而不再死抱着某一种方法。然而,实用主义者在描述他们的方法论时,却经常使用含混的语言。他们会使用一些相当宽泛的词汇(如混合方法)来表示在进行一项研究或一系列研究时所遵循的若干种不同的方式。Datta 在提到这种她所谓的“杂糅模型”(mixed-up models)时指出,这源于“世界观的回避与实用主义或混合模型研究的理论”。她的结论是,“这种理论尚有待于得到透彻的阐释”(1994:59)。

我们不敢自称能在这本小册子中为混合方法和混合模型研究提出一个正式的理论,但我们的确希望能够为将这种研究更系统地概念化提供一些指导方针。在介绍我们对混合方法和混合模型研究的分类之前,我们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简单介绍与范式之争及其解决相关联的一些主要问题。

关于范式之争的更多详情

以下所述涉及范式之争及其如何获得使社会科学共同体多数成员感到满意的解决方法,这是专为那些对此尚不熟悉的读者所作。对范式之争历史的简要回顾并不是要在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上展开鸿篇大论,而仅仅是对范式之争及其结局作一番走马观花——对这些问题已经熟悉的读者当然可以跳过这一部分。

有关范式的争论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从其持续时间之长便可略见一斑。Hammersley(1992)注意到,关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争论实际上起源于 19 世纪中期;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在社会学中浮现;而最近这一争论重新获得关注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定性研究偶尔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中的复兴,因为这两个领

域在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都被定量研究(调查或实验)所支配(Hammersley, 1992)。

尽管存在着这两种主要的对立主张,但显然,人们所提出和辩护的哲学取向或哲学范式远不限于此(如 Greene, 1994; Guba, 1990; Guba and Lincoln, 1994)。我们将提到的有四种哲学取向,即逻辑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建构主义(还有其他一些变体,如解释主义、自然主义等)。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些取向展开讨论,是由于它们代表了范式之争各个主要阶段的不同方面: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②后实证主义的盛行;③建构主义的崛起,之后即发生范式之争;④实用主义和相容理论。本章接下来的四个小节将简要地描述其中的每个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

实证主义(也称逻辑实证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的法国哲学家 August Comte。实证主义将知识仅仅建立在可观察的事实上,拒绝对“终极起源”的猜想。Lincoln 和 Guba 为实证主义归纳了这样几条公理:

1. 本体论(现实的本质):实证主义者相信存在着唯一的现实。

2. 认识论(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实证主义者认为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3. 价值论(价值在研究中的作用):实证主义者认为研究是价值中立的。

4. 通则化:实证主义者认为超越时间和情境的通则化是可能的。

5. 因果联系:实证主义者认为在结果之前或同时,必有真正的原因。

此外,我们还要增加一条为许多作者(如 Goetz and LeCompte, 1984; Patton, 1990)所提到的第六条公理:

6. 演绎逻辑:强调从一般到特殊的推论,或强调预先的假说(或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逻辑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哲学已不

受信任(如 Howe, 1998; Phillips, 1990; Richardt and Rallis, 1994)。1950年代和1960年代,整个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中对实证主义的公理(尤其是关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的不满变得越来越流行。正如 Guba 和 Lincoln(1994)所言,后实证主义是实证主义的知识后裔,并从这时开始致力于解决那些备受诟病的实证主义原则。

后实证主义的盛行

后实证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如 Hanson, 1958; Popper, 1959)出现于1950年代末期,很快就在整个社会科学共同体中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后实证主义对广受质疑的实证主义公理作出了反应,它的许多立场与其实证主义前身正好相反。

尽管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许多定量研究者仍然采用实证主义的原则,但是 Reicharde 和 Rallis 令人信服地指出,当时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定量方法论者在研究取向上却是“不加掩饰的后实证主义者”。Reicharde 和 Rallis 认为,这些方法论者是后实证主义者,因为他们的著作表明他们赞同以下后实证主义的原则:

- 探索中渗透着价值(value-ladenness):研究受到研究者价值观的影响。
- 事实中渗透着理论(theory-ladenness):研究受到研究者使用的理论、假设或框架的影响。
- 现实的本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是建构的。(关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第2章)

现在,这些后实证主义者的原则已被定量取向的研究者和定性取向的研究者所共享,因为它们更好地反映了人们在20世纪后半期对“现实的本质”以及社会行为研究操作的共同理解。Reicharde 和 Rallis 断定,相较于逻辑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更准确地描绘了当代定量研究的特点。他们指出,一个定量取向的后实证主义阵营已经形成,其中包括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一些最著名的定量取向研究者。

例如,实验心理学者 Rosenthal(1976)花了很长篇幅讨论什么是“实验者效应”:实验者的观察、感觉或者行为,都可能会在无意

中影响研究的结果。Cook 和 Campbell(1979)是两位确定无疑的定量取向研究者,他们承认实验者的偏见会损害研究的效度:这种实验者偏好充分地展现了方法论方面所存在的缺陷,而这一缺陷会导致事实中充满了价值观念或理论(这正是后实证主义者的基本观点)。Cook 和 Campbell(1979:24)在讨论社会科学的因果联系时指出:

我们同意后实证主义的观点:观察是受到理论渗透的,为表达数据而建构精细的科学工具和程序时常常会或明或暗地接受一些很成熟的科学理论,而这些理论超越或涵盖着正在被检验的理论。

与此相似,实验社会心理学家们(如 Jones and Davis, 1996; Jones and Nisbett, 1972)也研究和讨论了个性因素(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s),这涉及行为者—观察者在感知上的不同。就人格理论(personality theory)的检测是否会在操作中受到研究者个人因素(如价值观)的强烈影响,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样一个案例再次说明了那些使用传统实验方法和定量数据的研究者也在积极地探索和讨论后实证主义的原则,如价值渗透事实等。

由此,在1960—1980年,定量方法论者对一些后实证主义的原则进行了论述,并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但是,尽管这些方法论者支持那些与后实证主义相关的假设,但不要忘记,他们是在一个强调“方法论正确性”的传统内从事研究工作的(Smith, 1994)。因而当面临着在定性取向和定量取向之间择一而行时,这些方法论者倒向了实证主义,对堪称实证主义之标志的实验设计表示支持。例如,Cook 和 Campbell 强硬地回应了对其研究效度特性的批评意见,断言“我们认为,读者们相信因果推论是重要的;而在获知原因的多种方式中,实验方法即使不是最有用的,也是最有用的之一”(Cook and Campbell, 1979:91,原文是斜体)。

在这本出版于1979年的名著中,显然可以读出两位作者对实验型(或准实验型)研究及其价值内部效度的高度青睐,以及他们对因果推论在严格限定的背景中才可能展开所持有的信念。

建构主义在范式之争前的崛起

实证主义的声誉江河日下,这又导致了比后实证主义更为